

■聚焦

余艳长篇纪实文学《杨开慧》:

爱的痛苦与灵魂的升华

□王宏甲

我读文学作品,总会关注这个作品有没有打动我的东西。有时,那动人的东西是被掩盖在叙述中的,或被掩盖在某种形式里面,我不能肯定这是优点还是缺点。余艳的《杨开慧》让我读着读着,逐渐感觉到作品内在的光华从叙述中透射出来了。

首先打动我的是这部作品的文学性。当代世界人们对纪实文学作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很多纪实文学作品缺乏文学性,难以让读者在阅读中进入欣赏的状态。余艳写过不少小说,这次走到纪实文学领域来,对她可能是一种约束,却也可能带来一些进步。在余艳笔下,杨开慧这个人物性格鲜明。比如写杨开慧的感情,爱和意志,写她自小就非常敏感,长期非常自尊、自强,这些都是性格方面的表现。随着作品的进展,我们还在杨开慧身上看到不同于传统中国女子的性格。文学作品有没有写好人物,这个人物有没有性格或鲜明的个性是重要标志。这一点,无论是虚构的小说还是非虚构的报告文学,都是极要緊的。个性,并不是那种故意写出来的与他人不同的东西,而是人的品格中那种坚定的,不为压迫所变、不为利益所移的性质。作品中杨开慧不为人迁就的爱那么鲜明,而且,她的性格凝聚着家庭教育的特征,打着她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杨开慧,出现在中国20世纪的早晨,俨然是闪耀着新世纪曙光的新女性。

《杨开慧》集中描写了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也写了毛泽东在井冈山与贺子珍的相爱。我以为这个作品不是写婚姻,而是写了超越婚姻的爱。体现在杨开慧身上的爱,包括当地听说贺子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有关消息,她心里非常纠结、痛苦。杨开慧的心情与心境,不是作者余艳能随意书写的,其真实性建立在杨开慧的手稿中。杨开慧把手稿写在家乡板仓住宅的墙壁上,直到1982年当地政府修葺其旧居才被发现。《杨开慧》主要是凭借杨开慧手稿来展开情节的,这就使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地面对杨开慧的灵魂,倾听她心灵的诉说,她的情感、她浸透着爱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灵魂的升华。她把她的倾诉全部封存在墙洞里,余艳在作品中写道,那安放杨开慧手稿的墙洞成了她“精神的闺房”、“心灵的邮箱”。

在杨开慧手稿中,有一句“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不论世人对这句话是否认同,它是杨开慧的心声,出现在中国20世纪早期,这声音是惊世骇俗的,也是我们理解杨开慧婚姻观与爱情

观的一把钥匙。这句话写于她夜不能眠,万分思念毛泽东而又内心纠结的时期,透射出的是一种超越婚姻的纯粹的爱。这种爱产生于杨开慧心中是有深刻基础的。她生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二年。1916年袁世凯猝亡,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一个社会的黑暗,莫过于外患侵凌、内政混乱,无法无天。杨开慧16岁就接触到了这个最黑暗的社会。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新民学会,同年首次来北京并曾在老师杨昌济家中住。正是这期间,18岁的杨开慧与25岁的毛泽东萌生了相爱的情愫。1919年,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查封,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也住在杨家。这时的杨开慧已读到毛泽东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对毛泽东深为敬佩,他们的相爱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1920年冬,杨开慧提着一个装着衣服的小箱子,独自来到毛泽东所住的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宿舍,与毛泽东结婚。这里没有嫁妆,没有花轿,没有新房,没有酒席,但是有爱。杨开慧正是以这种不要一切仪式的结合,热烈地表达她深刻的爱。

杨开慧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都不理他。我是真爱他呀。天,给我一个答案吧。”这段话后句中的“他”,指的是毛泽东。余艳接着写下,其实答案早有,就在杨开慧自己身上。余艳写出这句话是不简单的。真正深刻的爱是出自心灵的,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是因为杨开慧有她的理想、她的追求。这个作品,写的就是杨开慧十八九后的选择,她心中的爱。

这爱,还基于对毛泽东的深刻理解。作品里写杨开慧早就说过,毛泽东不会去法国留学。确实,毛泽东在送战友启程赴法勤工俭学时,有人为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革命不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杨开慧知道毛泽东在中国的现实中寻找救中国的道路已思索得多么深。此后,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杨开慧一同参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渗透了杨开慧诸多细致的工作,包括案头文字工作。

余艳在作品中问,杨开慧为什么要写那些遗稿,写了又为什么要把它埋进墙里去?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她不能让国民党看到,也不能告诉孩子。她心中回旋的话,能与亲人讲、与挚友讲吗?他们能理解她吗?为什么不能讲?这里真正的秘密是她深爱毛泽东,要维护毛泽东,惟恐自己说出什么有损于他。

杨开慧书写那些手稿的过程,是她不停地理解毛泽东的过程,最后她真正完成了从婚姻到爱的解脱,这解脱就是爱的涅槃。用杨开慧手稿的话说就是,“我是为他而生,我为信仰而死。”这个作品写出了杨开慧、毛泽东为救中国而共同投身的信仰,写出了杨开慧为爱和信仰全然投入的状态,一个新女性的爱情观和生死观。

这不仅是作品的思想,更是人物的境界。当杨开慧完成了一个用文字梳理自己精神的过程之后,她把文稿封进了墙壁,如同一个仪式。她要求组织上安排她工作,因为她不满意自己在东躲西藏中度日,在不同的地点继续与毛泽东共同奋斗。这是她被捕的真正原因。入狱后坦然赴死,那是她早已准备好的。我在杨开慧形象中突然看到了“死神”的光芒。死神是了不起的,死可以称为神,因为它是不朽的。杨开慧入狱后不是无可奈何,而是始终保持着积极的状态。她叮嘱亲人从狱外给她捎来口红等化妆品,就义前,把自己打扮漂亮,清清爽爽地走出去,所有这一切从心灵到外表,都有一种神性的美。余艳感觉那安放杨开慧手稿的墙洞犹如她“精神的闺房”、“灵魂的邮箱”,我则感觉那是她“灵魂的神龛”。

我因此想起了屈原的《山鬼》。蒲松龄所谓“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那骚,是离别的痛苦,也是渗透灵魂的爱。山鬼总在为所爱的人着想,他为什么没约前来?是不是下雨?是不是天黑了?是不是生病了?作品中的杨开慧,也是从头到尾都在为毛泽东着想,为他而生,亦可为他而死。敌人要她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她宁死不肯。因为她丝毫不肯玷污毛泽东,也不能玷污革命信仰。不论毛泽东怎样,她都一往情深地深爱他。这就是一个女人超越一切的爱。这样的爱,实有上承骚韵的悠久文化源流。

《马克思传》中,生于德国一个贵族之家的燕妮作为马克思的妻子,做出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列宁传》中,克鲁普斯卡娅陪同列宁到西伯利亚流放,成为列宁的夫人,也非常动人。这样的爱情,都是人类文化宝库中可以用艺术去表达、去欣赏、去景仰的。

长篇纪实文学《杨开慧》还可以让人们看到,今日的婚姻观、爱情观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精神的内质。近一个世纪前,这样一名中国女性热爱读书,热爱自己的祖国,关怀穷苦民众的生存,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全部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的爱人和所爱的一切,这是一个先辈珍贵的赐予。

■创作谈

我是被6个字压了3年,从3部65万字的作品中提炼出的《杨开慧》。

这6个字源于一段话,杨开慧纪念馆彭馆长和开慧镇党委王书记曾一人握我一只手说:

“板仓,每年以20-30%的游客量递增。平均每天几千人,参观后的感慨,归结起来6个字:‘可惜了,值得吗?’多少文人来了,又走了,都没回答这个问题。可老百姓心头一个死结,谁又能解开它,我……我们给他,磕头!”

顶着这沉甸甸的6个字,我出发了。

20多次去板仓,湖南境内的红色景区都跑了遍;一个人开车上井冈山,茨坪、茅坪、黄洋界、象山庵,一站一站走。要打通历史、接地气,要画英雄的骨、要写英烈的魂,是真正的走。一代伟人的青春、热血都洒在这里,不用停留脚印,不用深入挖掘,让众人的纠结依然堵心,历史的真相仍旧模糊,我还有什么担当、责任可言?

走访回来后的创作,是三番五次地改,七回八落地磨。与其说,我反反复复改一个作品,倒不如说一个作品在循序渐进地改变我。一次次走访就是一次次心灵净化,一点点的感动终化作一种动力。写完这部作品,我觉得自己变了,变得能吃苦、肯担当、有责任了。

这次的创作与之前不同,没人催我,是自己心甘情愿一部接一部地写,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倾尽情感。我也是妻子、母亲、女儿,我常问自己:如果我是开慧,会怎么想、怎么做?又把杨开慧拉到现在,她无怨无悔的忠贞和付出,不正是现代青年的精神缺失吗?差距就是作品要填补的,不足更是自己要修炼的。让历史照见现实,让星火传递未来,这部作品激发了我从未有过的使命感。

真正和杨开慧接通是在板仓故居杨开慧卧室坐了一夜,从黄昏到黎明,从孤独到寒冷。挑数九严冬的大寒天,风雨飘摇的油灯下,像当年开慧无数个独处夜,用真实的感受、刻骨的体验,向开慧的心灵靠近,再靠近……

一次上井冈山,一个人一站一站地走,找证人、做笔记、听录音。找寻当年毛泽东打探杨开慧的见证人;去黄洋界,看炮火中毛泽东给李立三写信、辗转寻杨开慧地址;再去古樟簇拥的象山庵,看毛泽东在什么情形下跟贺子珍结婚……同时,当年国民的婚姻状况、恶劣环境下的残酷现状,都是我认真考证和思索的课题,这一切,最终确定了“用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这一创作主题。

创作中,我不断审视小说的谋篇布局、散文的语境笔调、新闻的踏实史料,用26年做记者、写散文、磨小说的艺术沉淀,苛刻地讲究阅读节奏、强求细节说话。常常是,写着写着,又颠覆重来;读着看着,再改了又改……

一遍遍的打磨中,作品的人物脱掉了单一的红色外衣,还原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躯体;在一点点对照历史中,思绪穿越百年岁月,细节和故事又与今天的生活对接;人生的起伏、人性的纠结,让我静心去写好每一个细节;生与死的意义、理想与爱情的完美,都在反复思索后成为今天的借鉴……将自己干脆彻底地掏空,全体调动、集结出征,只为打一个超越自己的漂亮仗。

一部作品历尽坎坷磨难,这在我20多年的文学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我因此懂得了珍惜。痴狂的夜以继日,不时有泪水绵绵或者笑声明朗。直到现在,我还在这氛围里出不来;直到今天,我还满脑子都是走访、创作……我知道,我这是幸福地劳累着、快乐地痴情着。

值得吗?值得!

■第一感受

归向“杂于一”

——读朱强的散文 □苍耳

纯散文写作强调“纯于一”,即从取材、营构到形式、语言,都要凸显文学自身独特的话语与价值。然而,在一个急遽裂变、泥沙俱下的新时代,纯散文写作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多困惑与困境。持守“纯”,是否就能守住“一”呢?

朱强的散文富有探索精神,他写作的“钻头”不满足既定的“矿藏”,也不满足被滥用的固定视角,以独具个性的方式接通地气。《墟土》(载《人民文学》2014年第2期)的中心物象是“土”或“墟土”,由此展开的两翼是现场与象征,前者为实,后者为虚,相互交织。当人们将焦虑的目光投向古建筑被“拆迁”时,朱强却发现了被忽略的、不同文化断层的“墟土”:“古老的房屋断断续续都倾圮了,年复一年,零落成荒烟蔓草。瓦砾、灰土、朽败的檩条,被陆续迁来的居民清理、回填、平整。废墟,最终就变成平地,新的建筑在废墟里竹节似的生长起来。”一个文明古国的蕴含不仅在博物馆,在书册,更在墟土。

文学的意义在于从“无用”中看出“有用”,从日常麻木中刺醒文化之痛。当庞大的挖土机带着巨铲掘地九尺时,墟土“呈现出一道巨大的断面,斧切刀削般地光亮着。这道光,深入地下,少有三米。”试问,谁目击过这道来自地下的光?怎样才能让世人感受这迟到的战栗?

朱强利用“墟土”的黏性将当下细节与古代场景粘合一起,复活那不同色块所对应的古

典时空,揭示出今人所站立的“地面”正来自不断叠积的文化之“墟”。作者叙述或复原了“墟土”形成的过程,同时指证了古典的“根气”:“当年外公在我五岁时候,口口声声指着建国路上那一截断墙,说,这就是当年的皇城,他很希望这种虚构的荣耀——能够从他的骨血里流经到我的骨血里。”就这样,作者让象征的“墟土”在叙述过程中断续发出沉厚之光。

这种对复杂的经验、时空、文史、哲理的糅合与把握,以鲜活的意象组合展现出抽象画般的思想截面。在进行垂直、立体的穿透式叙述时,朱强始终紧扣对家族私生活的反讽式叙述——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拆迁”悲喜剧,时刻牵动着那块“墟土”以及古文化积淀在当下的命运。尽管古代也有“拆迁”,因为战乱、灾荒和改朝换代也会出现废墟,但下面的“墟土”却未曾触动,巨大的“气场”不曾损伤。然而在当下,一千年后的“墟土”转瞬就被挖空、运走,以至于“我就在城市被悄无声息地运走以后,日复一日地生长起来。渺渺兮予怀,心里却生长出了

一个个巨大的空洞,在古代,故乡的失去,是因为人的离开,因为距离,因为大山大河的重重阻隔。现在我们一步也没有走,是故乡的失窃,故乡的隐蔽退场,使所有的人,生活在别处”。

这种发现与揭示显然来得更深刻,更触目惊心。朱强的写作是在探索“杂于一”,并以此为指归。他不避日常的芜杂与琐碎:“有天傍晚,我看到田螺岭18号住着的那个男人,还特意地蹲在门口的台阶上,大口大口地吃饭。九华阁12号那个阔脸大屁股少妇,还满脸幸福感地和她家的长毛狗打情骂俏。特别呢,是百家岭巷2号的房东太太,尚且兴致勃勃地往处处女地里种白菜。所有的这些迹象,都让我觉得,所有与墙上那个红红的拆字有关的,完全是一个个虚构事件。……我常常是从西津路的某个门洞进去。走田螺岭巷,经过郁孤台的大山门,下一串台阶,到花园塘,花园塘左边是东溪寺,右边是九华阁、白马庙、大树下、丹桂井、上下竹丝巷,路途中,通常会邂逅某某晾晒在电线杆上的红裤衩,听见某某姑娘洗澡的水流声,闻到某某家韭菜炒蛋的袅袅香气,遭到某某女人爱狗的恐吓,受到某某民国遗老的赞赏。然后就溜到八境公园的水塘边,高高地来一个瘦影自怜秋水照。”这段文字写得“杂七杂八”,但又丰饶无比,其中巧妙地穿插着老街旧巷和老旧的生活方式。它们正在成为一道即将消失的风景线——那将是一层看不见的“墟土”。

操控这样繁复的结构,各个部件之间难免会出现龃龉与瑕疵,但作者确乎在“杂”中向那个“一”运思、使力。散文内容的“杂”被作者精心设置的“墟土”所统摄——物象的、现场的、想象的、象征的“墟土”,不仅为读者打开了墟土内部的文化、精神叠层,更透露出作者运思“杂于一”的技巧秘密。在另一篇《隐者居》中,作者抓住并展开“隐”与“显”的矛盾,以此深入那个纷扰的明末乱世和朱耷的内心隐衷,在“江山”、“神笔”与“隐身草”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对称的联系,极具张力。朱强的散文注重追寻或晕染那个根性之物——在朱强的写作中,始终弥漫着无所不在的文化情怀。它源于阅读、沉浸和反省,更源于秉性、血液和灵魂深处。在《虚实》、《突然贴》、《省府大道》等篇什中,作者写的虽是日常起居和寻常街道,但字里行间无不浸润着个人对本土文化的体悟与忧思。然而,“文化”也是危险之物,写作更是高空走钢丝的活儿,因炫技而闪失,则是朱强应该警惕的。

两项微型小说评奖启动

本报讯 为鼓励微型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和江苏镇江市文联、上海文艺出版社日前决定,同时启动“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2013)”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2012—2013)”评选活动。

据介绍,“年度奖”的评选范围为2013年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省市级以上报刊上首发的原创单篇微型小说,篇幅不超过1500字,由镇江《金山》杂志负责征稿。

“双年奖”的评选范围为2012年至2013年12月期间公开发表的原创微型小说,由上海《文学界》杂志负责征稿。征集参评作品截止日期为5月15日,评选结果预计于下半年揭晓。(欣闻)

刘赦中国画在京展出

本报讯 4月20日,“如有如无外山——刘赦中国画展”暨研讨会在北京恭王府举行,展览展出的80余件作品皆为刘赦近年在中国画艺术上的实践性探索,是其艺术创作实绩的阶段性回顾和集中展示。

刘赦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他的中国画以无名山水入画,以瞬息迥异之心境朗照风景四时之变,以当下的视野重审传统人文精神。其对“灵

性的深切体悟,得益于对个体心灵力量的历练与提取,传承着传统文人画的精神。刘赦在作品中并没有强调其或传统或现代的时代身份,也没有割裂空间上的东方和西方,而是在传统语汇与现代图式之间转换,既有意义又无心,不经意恰恰流露出一片“如有如无外山”。

作为“恭王府艺术系列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20日。(武翩翩)

山东研讨抗战文学

本报讯(记者 刘秀娟)近日,由山东省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山东省现代文学学会、德州学院、德州市作协主办的“抗战文学暨《长河谣》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德州举行,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长河谣》是德州作家季桂起的长篇小说新作,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以鲁西北地区真实的抗战历史为背景,以德州石桥镇几个大家族的冲突与纠葛为线索,再现了

民族重大灾难中的政治冲突、家族故事和人物命运,重新发

掘了德州市民的民间力量,谴责了侵略战争对美好生活的毁灭。

与会专家认为,优秀的抗战文学不仅要表现政治与军事的较量,更要探讨价值观、文化精神及人性的内涵。《长河谣》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的据实可信,作者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进行艺术虚构,符合历史小说创作的基本法度。

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会近日正式成立。作为广州市文联的团体会员单位,文研会的成立标志着广州文坛在创新岭南文学发展机制、大力挖掘广州文学新秀等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会由何建明、程扬、蒋述卓、伍第政担任顾问。邓鸣当选为主席,鲍十、顾偕、谢友义、巫

玲、袁建华、沈平、肖爱民、刘迪生、黄礼孩、曾大兴当选为副主席。据悉,文研会成立后将大力实施“文学穗军”工程,通过制定落实“文学名家造就计划”和“青年英才开发计划”、推行“文学精品计划”等形式,不断推出文学精品。文研会还将创新形式,与社会各界广泛合作,不断开拓文学创作的合作平台。(穗文)

《海外文摘》年度文学奖颁奖

本报讯 近日,《海外文摘》2013年度文学奖颁奖仪式暨全国散文作家梨花笔会在“中华果都”江苏省丰县举行。张新科的《远东来信》、吴昕孺的《鸭语》、鲍尔吉·原野的《月亮颂》、赵德发的《在三教堂》、华美的《为一个怨恨者的死亡而悲伤》、

刘建华是江西宜丰籍女作家。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宝往事》以宜丰县天宝古村为蓝本,通过截取清末国家衰败的历史片段,讲述了宜丰江右名士——刘氏家族在衰败中图强并自发探索复兴之路、把宜丰土纸工艺发扬光大的传奇故事,展现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矢志不渝的民族梦想。与会者认为,《天宝往事》故事构思精巧,语言生动,具有较强的历史理性、本土文化意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江闻)

《一个都不放弃》关注特殊教育

本报讯 近日,关注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和智障儿童生命的纪实文学作品《一个都不放弃》首发仪式在浙江宁波举行。该书由宁波市青年作家钱利娜创作,宁波出版社出版。

刘建华是江西宜丰籍女作家。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宝往事》